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回答本报记者提问表示——

财税改革进度基本符合预期

本报记者 崔文苑 郭子源

3月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召开记者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全面营改增“军令状”已下

“有学者担心，怎么看待财税改革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另外，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财税改革的‘落地率’？”对于《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的提问，楼继伟回答得很诚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用了一章讲财税改革，我们非常努力但有些目标没有达到，或者说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进度慢了一点。”

楼继伟表示，总体来说，财税改革基本达到预期进度。以预算改革为例，无论是预算编制还是预算执行，都贯彻了预算法的基本准则，比如先有预算后有支出、预算调整的程序、预算公开到什么样的细节、对地方债规范管理等等。

“有些方面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楼继伟说，一方面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观念需要转化，旧的思想观念、利益藩篱也是干扰改革实施的阻碍；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需要在顶层设计之下坚决地推进，要啃硬骨头。同时，还要增强各方面的协调性，调和好各方面的矛盾。

“这些未达预期的改革中，税制改革稍微慢了一点。”楼继伟表示，去年政府工作报告讲到力争完成营改增，去年没有“力争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军令状”已下。

积极财政政策要适应新常态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适应新常态，推动经济健康平稳增长？

楼继伟认为，首先要保证一些重点支出。在严控“三公”经费增长，及时压减收入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不可持续支出的同时，相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支出，给地方更多自主可支配财力。比如，按照脱贫目标增加扶贫方面的支出；压减小、散项目，并安排了5000亿元中央基建支出，集中用于属于中央事权的、跨域的、公益性比较强的重大基建项目。

同时，今年还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方面的支出。“今年预算安排了500亿元，明年准备再安排500亿元。”楼继伟说，根据各地完成去产能任务的情况、安置职工的人数、当地财政困难程度等情况，这个数字也可以调整。

2016年，政府新增债务额度为1.18万亿元，比去年6000亿元扩大了近1倍，新增债和置换债出现“双升”，还有无赤字空间、如何控制财政风险？

“有没有赤字空间，关键看赤字用做什么以及财政政策做适度支撑之后经济的恢复能力。”楼继伟说，财政部对赤字的使用保持着“黄金原则”，也就是债务用于资产支出，留下很多优良资产，而非用于基本支出，通俗地说就是，借钱可以买房子，但“吃饭”要靠发工资。

“在保持防风险这条底线的同时，



3月7日上午，在北京梅地亚新闻中心，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右图为《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还要防止地方政府在预算法规定之外出现新的债务口子。”楼继伟说。

简单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

个人所得税改革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个税起征点会不会提高？

对此，楼继伟解释说，所谓起征点，就是工薪所得减除的费用标准，之前曾多次上调过这一费用减除标准。事实上，和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我国实行的是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但改革方向应当是综合所得的减除标准。因此，在“老框架”下继续提高起征点是不符合改革方向的。

“直白地说，简单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楼继伟分析，一个月收入5000元的人，可以把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赡养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继续提高减除标准不符合我们的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个人所得税改革一直想做，为什么还未做到？

“太复杂了！现在有11项个人所得收入，要将其综合在一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薪项下的扣除，而是说要做分类的一些扣除。”楼继伟举例，比如，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费用的扣除；再如，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大学阶段，都要给予扣除。税法对此总要有统一的标准。

“另外，还需要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对一些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楼继伟说，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的要求，今年要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接下来，更复杂

的在执行方面，根据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部分，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个人习惯的建立，再逐步完善。

兼顾企业和财政承受能力

“营改增试点下一步要推进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这是最大的难点。”楼继伟表示。

难在哪里？他回答说，首先是企业多，“这四个行业的企业户数达到了960万户，其中的生活性服务业更占大头。而且，这四个行业对应的营业税原来是1.9万亿元，占原营业税总收约80%”。

为什么必须改革？“营业税是按照企业流转额、交易额征收的税。”楼继伟说，如果把某一个销售环节或是研发环节独立出去，就形成了新的交易额，就要再征一次税。所以，要打通这个抵扣链条，在每个增值环节征税，就可以减少重复纳税，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税率的设计也要简洁，要考虑企业的税负变化，还要兼顾财政的承受能力。”楼继伟认为，可以做到行业不增负，但不能保证每一个企业在实行营改增时税负都不增加。据介绍，对于企业租来的房产、投资的不动产，新投资的部分可以参与抵扣，但以前投资的不动产不能抵扣。“这在开始阶段可能有税负的变化，需要逐渐消化。不过，企业若投资额较大，抵扣额也大，还可能出现企业一两年不用交税的情况。”

“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怎么办？”中央和地方都会减收。总体考虑，维持目前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安排过渡性的中央地方收入划分办法，以便解决地方收入减少的问题。”楼继伟说。

把债务风险控制住

有分析机构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债务负担过重，可能会导致经济放缓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对此，楼继伟回应表示，“确实有这个现象，但又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各国面临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美国现在债务率比2008年高了很多，但是经济在复苏过程中；而有的国家债务率非常高，但持续紧缩，还没有从危机中走出来。

楼继伟表示，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并不是很高，特别是中央财政还有继续发债的余地。“我们首先要解决债务不规范的问题。如果债务都按《预算法》规定是显性的，不是变相发债，就不用担心。”

楼继伟说，去年，全国人大批准了地方债务余额是16万亿元，其中15.4万亿元是2014年底以前的地方债务存量，这个存量中有1万多元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过的债券，剩下的则是非规范的债务。

楼继伟说，去年下达3.2万亿元置换债券解决到期存量债务，今年地方还有5万亿元左右债务到期，因此继续允许地方发行债券置换到期债务，明年再做一些基本就能置换完毕。

“在债务余额控制好的情况下借新还旧，不是大问题。”楼继伟说，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经济增速放缓时，地方政府代偿的比例会扩大，要做好控制；另一方面，防止利用各种方式变相发债，要关注和规范PPP项目，防止其成为地方政府变相借债的项目。

“把债务风险控制住，才不会给经济造成大的伤害。”他表示，只要全社会的杠杆降下来，政府的杠杆才可以逐步释放。这是一个相互替代的过程，也是政策必须考虑的。



苏增添代表——

推动自贸区建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本报记者 林火灿 石伟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苏增添建议，在福建自贸试验区设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重点研究开发、上市和交易利率衍生品，并根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适时推出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为国内各类投资者提供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

苏增添代表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和贸易活动，沿线国家也将大量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和投资。但从利率及汇率环境看，跨境资金流动的短期波动将进一步加剧，需要利率期货等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资产风险管理手段。

苏增添代表表示，目前，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债券交易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产品类型、交易方式和监管架构均存在差异，推出利率期货有利于推动我国债券市场的统一化进程，对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厘清监管边界，探索金融综合经营和综合监管新模式、新经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实践经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朱克江代表——

建设中韩双创合作新高地

本报记者 薛海燕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委书记朱克江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放发展”理念，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在开放中增强发展新动能、增添改革新动力、增创竞争新优势。江苏盐城市作为中韩自贸协定明确的中韩产业园首批合作城市，将着力打造东部沿海发展的开放窗口、产业高地、创新标杆，努力在国家战略大局下有所作为。

朱克江代表介绍，盐城与韩国隔海相望，全面拓展提升对韩开放合作，是盐城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优先选择。近千家韩资企业集聚盐城，每年有2万多名韩国人来往于盐城和韩国，韩国已成为盐城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和贸易合作国。

按照中韩两国政府商定的建设全方位创新创业平台的设计，盐城将重点打造中国沿海汽车城、韩资工业园、盐城综合保税区、盐城未来科技城、韩国社区、国际美容健康城、生态智慧康居城、盐城海港、盐城空港、韩国风情园等十大功能平台，加快发展汽车、新能源汽车、“互联网+”、智能装备制造、光伏光电、跨境电商、健康美容、大数据、现代服务业、重型高端装备制造业等十大产业，推动园区建设快起步快起步。

李长安委员——

生态先行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

本报记者 李丹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我认为生态环境必须先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李长安说，长江流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屏障，更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同时，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又极为脆弱。如果高强度开发，必然会引起很大的环境问题。

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面临的重大课题。李长安委员建议，长江经济带建设首要的任务是做好顶层设计，应当首先制定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并赋予法律效能。

碳排放权交易的模式有利于排放总量控制，不仅能有效控制工业排放，其市场机制下形成的碳金融市场还可为欠发达地区的低碳发展、转型发展提供充足资金。为此，李长安委员建议将湖北武汉打造成为中国碳金融市场中心。已建成的湖北碳排放交易中心经过近一年运营，流动性、规模、品种均居全国首位。

为了提高公众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意识，李长安委员还建议，将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为“长江日”，让更多人参与到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行动中来。



◎会当凌绝顶：营业税改增值税是较为合理的。过去的营业税，不管你是否有利润，必须交税，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石空：有好政策，还要能落实到位，真正做到百姓受惠！

◎听说：希望挖掘潜力，保持发达城市经济正常发展，并将关注点更多转移到贫困地区。

◎耿利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区，减少土地流失治理工作，利国利民！

◎如果：“十三五”目标已定，要靠每个人去努力实现。产业升级，中国梦成真！

（本报记者 杜秀萍整理）

新闻深一度

3%财政赤字不是强刺激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林火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从2015年的2.3%提高到3%。那么，3%的赤字率算不算强刺激？

“今年大幅增加财政赤字，正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力度的表现。”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很大，需要通过减税增支、扩增赤字来激发经济内生动力。

张连起委员表示，增加赤字是要解决在降税减费造成财政减收的背景下，政府能适量增加必要的刚性支出的问题。首先，今年的脱贫攻坚工程

要完成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其中易地搬迁脱贫200万人以上，继续推进贫困户危房改造。还要解决好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等问题，这些都需要配套资金。其次，在去产能和民生改善过程中，人员安置、创业就业、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等，也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

据了解，“赤字率3%”是一个总量的管理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赤字率始终保持在3%以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财政赤字为960亿元，赤字率首次突破1%。此后几年财政赤字一直高位运行，2000年赤字率曾达到2.9%。2005年后，随着稳健

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中国赤字率相应降低。2008年重启积极的财政政策，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加力显效。2012年至2015年，中国财政赤字率分别为1.5%、2.1%、2.1%和2.4%。即便今年提高至3%，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赤字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可能有人会担心提高赤字率会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其实不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李礼辉认为，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6.9%的增速仍处于较高水平。而且，在经济增速换挡的过程中，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上保持在较低

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把赤字率控制在4%以内，不会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同时，还要降税减费，放水养鱼，财政压力非常大，适当提高赤字率到3%是必要的。财政能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张连起委员说。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果财政赤字率高于3%，其实也不必过于惊慌。”李礼辉代表说，中国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财政赤字率水平提高以后，能否把财政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本报编辑 孟飞